

之外逼近民居，喧嚣之声，至御禁御，未暇经理，又殿成即遇灾，以奉天门为常朝之所，故诸宫阙及各衙门皆未备，至宣德七年，始加恢扩，移东华门（东安门）于河东，迁民居于西之隙地……（正统）五年三月兴工，六年九月，三殿、两宫皆成”。^④元代皇城东墙在通惠河西岸（即今南、北河沿西），离大内较远；明代大内东移，逼近皇城东墙。皇城东墙外为通惠河（遗址即今南、北河沿），河东南市、民居稠密，喧闹之声，直达大内，元代没有的问题出现了。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是皇城东墙向东推进，但国家财力不许，连同永乐迁都当年即烧毁的奉天三殿及京城应备的文武衙门，永乐时均无力建设。到宣德时，才将东安门及皇城东城墙东移，而奉天三殿到正统六年才恢复。由此可知，明代大内向东推移，明人习知之，并无疑问，而东移的确切距离，年代久远不可细追。

解释元代大内较明代偏西，明代宫城向东推进，亦应当从元、明不同的设计思想来看。任何朝代，要进行京城、皇城、宫城的设计，肯定有他既定的规划指导思想。元代以太液池为中心，左边建大内，供皇帝居住，右边设隆福、兴圣二宫区，供太子、太后居住，东西两部是一个大的有机联系的整体，而中心的太液池是东西两部共同的苑囿。东西两部形分神接，遥相呼应，共处于一个皇城中。太液池两岸宫殿之内侧不能存在很大空地，建设重大建筑，否则，就割断了两部之间的联系，反而将次要建筑捧到了中心位置。因此，元大内周围也不象明代那样，由护城河包围，更不能只在大内之外筑皇城，而将西宫斥之于皇城之外。明代则不同，明代建设紫禁城一依南京、凤阳之制，紫禁城是一个按紫微垣布置，体现五行、四象、三垣、两极等原理的紧密联系的整体，无论皇帝还是太后、太子，均在此城中，因而它本身就构成了皇城的中心体，外围加筑护城河。苑囿是皇宫附近必备的，明代皇帝自然相中了皇宫西侧的太液池，因

而就将太液池东侧（西侧元西宫此时尚存）留出一定空地，备充苑囿规划。这样，明代大内西侧除了留出护城河地方以外，还要留出太液池东岸一定空间。于是，明代大内只有向东推进。

清代袭用明代紫禁城，诸臣奉勅修撰《日下旧闻考》谓：“明代宫室各门名虽仍沿元旧，似俱移置东偏，稍加恢扩”。康熙至乾隆时人励宗万遍考金、元故迹，为《京城古迹考》，也认为明代大内比较元代“自西北而东南”。盖清朝前期，元代故迹尚多可考，史料也多可征，即如《永乐大典》所采《元宫室制作》一书，《日下旧闻考》作者即多涉猎，^⑤而今人不得而见。是故，明人言东移，轻松道来；清人言东偏，略感模糊，故著一“似”字；至于今人，史料既少，古迹渐湮，遂有东移与不变之分歧，也属常理。

（三）从实际测勘看，元大内较明大内偏西，明大内较元大内东移。

元代建设大都城，是于金中都城东北郊外建设。元代的科技水平已相当发达，其丈量土地，在方圆平直、取正、定平等方面已十分成熟。因此可以说，元大都城在经营位置上是十分精密的。惟其丈量如此精密，元人才在大都城中立“中心之台”。^⑥中心之台应是在最初大都城规划中丈量地域时设立的，这个中心点应是可靠的，它居全城南北、东西之正中。元大都北城墙至今尚有遗址可考，东西城墙即明清京城东西城墙，1969年夏在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了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。明代改筑北京城，东西两面完全按元大都旧城墙缩北拓南，试以今存的老北京城验之，其丈量之准确尤令人信服。因此，要确定元大都中轴线，最好的办法，莫过于实测。由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上测得：大都中心应在今旧鼓楼大街南口东侧。今鼓楼离此处120多米。《析津志》：“中心台，在中心阁西十五步。其台方幅一亩，以墙缭绕。正南有石碑，刻曰：‘中心之台’，实都中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之中也”。据《日下旧闻考》记载，清代“旧鼓